

论完美符号：“普天同文”的理论构想与传播机制

胡易容

摘要

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不断追求更有效的交流手段和更完美的符号。这种追求在语言中体现为一种“普天同文”的理想。本文从完美符号的理论构想解读入手,结合传播效用分析,得出了这种理想的现实悖论。连同图像语言在内的任何一种符号语言都无法对现有自然语言构成替代性关系,它们只是高度符号化的当代文明中涌现的又一组符号系统,而不是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元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天同文”已经以多元化的方式实现。

关键词

符号学、传播符码、语言、图像、编码

作者简介

胡易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桂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电邮:rongyi_hu@126.com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项目批准号:11XWW001)和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批准号:11FXW005)成果之一。

On Ideal Symbol: Theoretical Construct and Communicational System of Common Language

HU Yirong

Abstract

Human pursuits better communication tool and more effective signs. For example, a common language all over the world would avoid much trouble in communication. But the reality is not optimistic.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ideal symbol theory, any language could not replace the different natural language we are using now. In a sense, human has their common language in different ways.

Keywords

semiotics, communicational code, language, image, encoding

Author

Hu Yirong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E-mail: rongyi_hu@126.com.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s subsidized by the National Fund of Social Science(project number :11XWW001)and Guangxi Fund of Social Science(project number :11FXW005).

一、普天同文的动力与现实困境

人类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人类在符号使用上必然有着其它动物不能达到的高度。语言符号就是这种符号能力的典型体现。《淮南子》(卷八)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唐人张彦远(2007:1)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俚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可见,语言符号作为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人类实现了自我超越,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神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不完美。巴别塔寓言中,上帝令语言分化以阻止人类完成伟业,不能完成通天之塔的修建。语言符号分化所导致的人类纷争也非常频繁。不过,人类从未停止创造一种完美符号以弥补语言鸿沟造成的文化分裂以及语言本身的沟通屏障——这就是“普天同文”的理想。

要消除文字分化,归根结底是要消除文字发展中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差异消除得越彻底,越接近于一种普天同文的理想。文化差异的消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从文化本身着手;另一种是从文字符号本身着手。秦灭六国统一文字就是普天同文的一次以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统一。除了极端的武力统一,文化宰制也会实现类似的结果:欧洲教会使用拉丁语,连同共产主义中国在内曾经一度试图让俄语成为区别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共同语,但它们或多或少仍是某种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产物,并往往只令一种既有现成语言占据所谓统治地位而获得超语言,或“元语言”地位。

武力统一和意识形态的同化是直接有效的方式。然而,这种强制性和不对等性已不适用于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所追求的普天同文转而诉诸一种非现存语言。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实现真正的平等应当有一种文化中立的新语言。早期的著名尝试如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描述了通行于乌托邦中的“乌托邦语”(More, 1997: 60-72)。更复杂一些的虚拟语言还应当有成体系的语法规则。例如古英语教授托尔金在他的《魔戒》(Tolkien, 1999)等魔幻作品中创造的精灵语、霍比特语、昆雅语等多种语言。其中数种语言发展得非常完善,一些托尔金甚至用这些语言来写作。不过,它们仍是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的虚拟语言。

与这些虚拟语言不同,人们还试图创造以日常实用的通用语言。最著名的要数已延续百年的“世界语”。创立者柴门霍夫(Lazarski Ludwik Zamenhof)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创造了一种消除彼此隔膜的“平等”语言。时至今日,世界语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人的语言。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语是失败的。这些人工语言自然无法抗衡自然语言的丰富表现力。除了柴门霍夫外,此后的逻辑语(lojban, 又译作理语)更强调文化的中立。它通过奠基于是谓词逻辑,消除了语法上的文化倾向。此外还有沃拉普克语、伊多语及诺维尼亚语等。诸种世界语方案的失败是由于,它们标准化但缺乏自然语言的“文化语境”,因而只能成为某种特殊场所的“标准语言”。托尔金认为,各种人工语言注定是枯萎死亡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没有神话故事。

从符号表意的过程来看,人工语言缺乏符号释义的文化过程,而偏重指向对象(object)的映射过程。这就好比一套“密码”,它并不直接生成文化意义。因此,人工语言不仅不是“超语言”的,反而是“次语言”的。自然语言的文化意义累积是语言人造语言所无法达成的。人工语言最适合成为没有歧义的标准代码。这种优点令人工语言能够得到标准化的解码。人类已经创造了许多跨越文化规约的“共同语言”。例如:数学语言可以精确的实现建模和运算,化学公式可以得到理论上完美的物质生成结果,电脑编程语言可以精确无误的传递信息。

显然,这些精确编码的科学语言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语言乌托邦”有质的差别。即,人们希望建立起一种语言,它能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可能的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推定,一种完美的符号是否存在现实可能?

二、完美符号的理论推定

符号学家将人类的特有符号能力界定为对符号的“约定”能力——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称之为符号的任意性。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家认为任意性是人类符号世界最本质的力量(Saussure, 1969: 100)。索绪尔之后近百年的符号学研究表明,理据性正在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基本要素,其并不屈居于任意性之下。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下,符号具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我们常常判断某些符号更简洁、更有效率并因此而更具有传播力。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体系中,他整体性的引入了符号理据性要素。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将依据符号再现体(representum)指向对象(object)的不同方式将符号分为三类: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象征符(symbol)。皮尔斯认为,三种形式的符号“尽可能均匀的混合是完美的符号”(Peirce, 1931-1958: 448)。皮尔斯的完美符号观念可作如下解读:(1)过度像似的符号与对象缺乏释义的“距离”,其极端形式是“镜像”,会妨碍释义的自由程度。例如:许多文化批评家批判当代艺术追求清晰度和感官刺激,就是反对符号“能指化”的倾向;(2)过度指示的符号意图定点过短,同样会导致无限衍义的失败,最终使人们失去对艺术形象的自由“想象”。一千个读者在明晰的对象指称前,将自身想象力退缩为银幕上那一个哈姆雷特。(3)过度任意武断的规约符号,因其抛弃了原始理据及其使用的历史惯性,往往不利于经验性认知和掌握。也即,规约无法是纯然的任意武断。例如:索绪尔注意到,法律适合用天平来象征,而不是其它任意的符号。这表明,符号的关联不是全然武断的,而是必须存有历史理据。

现实情况中,这三种符号在历史的使用中是有所偏倚的。人类文化演化的符号使用系统日益复杂,可视为符号类型不断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阶段:第一,以像似与复制关系为主的图像符号阶段;第二,因果关系主导的抽象逻辑符号阶段;第三,纯粹意义的独立符号生产阶段。这三个阶段与皮尔斯的三类符号具有某种对应关系:第一阶段对应像似符号倾向,第二阶段对应指示符号倾向,而第三阶段对应规约符号倾向。从卡西尔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纵向划分可以看到,文明童年期的符号是透明性主导的,随着人类文明向高级阶段发展,规约性增强,原初理据性逐渐让位于“使用理据性”。

以语言为例,一种直观的印象是——人类文字系统越成熟,像似性越弱。文字符号的早期起源几乎都与图像有关,是有理据性的。随着时间推移理据性变得不可追溯。由此,文字符号的发展过程就是“生成理据性逐渐隐退并让位于任意武断的过程”。中国古文字、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玛雅文字等早期人类文字的起源都是基于像似性的。其后,西方世界的象形文字为拼音字母所取代;汉字符号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发展出复杂的“六书”造字法。赵毅衡认为,“中文实际上沿着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从像似符号,演变成指示符号,再演变成规约符号。”(赵毅衡, 2011: 89) 这是否印证了卡西尔的符号类型进化论?

不尽然。虽然从文字或某一的符号形态发展来看,文字系统原始理据性减弱了,但使用理

据则作为一种文化规约,在累积逐渐反而加强了。反过来,早期的文字也不是“非规约”的。不同文明的象形文字并不相同。例如“女”字在同为像似符号的不同古文字中其写法的差异。例如:“女”在中国的甲骨文中是一个下跪的形象“𡚰”,而在埃及文字中则强调其长发等生理特征像似“𐦎”,而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语则是用女性下腹三角和生殖器构成的形状来生成像似的文字符号“𐤎”。丁尔苏据此认为“像似性与理据性是并行不悖的”(丁尔苏,2012:118-131)。换言之,作为像似符号的古文字并不因此而稍减其规约符号的根本属性。

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分流在于,图像符号以像似性为特性的;而文字符号则是“指示性偏向”的。图像和文字的像似性和指示性偏向,导致了图\文发展路径的巨大差异。基于像似性基础的图像符号因其像似性而呈现出某种宏观的时空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文化语境跨越能力。即使是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其像似特性方面依然是易于理解的。在象形文字阶段,不同古代象形文字因各自不同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异,但这种差异显然远远小于现代汉字与西方拉丁字母语言。例如:苏美尔象形文字“水”、“日”的写法与中国的甲骨文就比较接近。而文字走向指示性和抽象性之后,像似特性迅速湮没在文化背景和规约之中,以至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造字初期的理据性微乎其微了。文字语言间的疏离是社会规约作用下的结果。

由上,社会规约性造成的语言分化,是由于语言脱离了原初的理据性——像似,而像似符号有可能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规约性而获得相应的跨文化识别效果。这是否暗示出,实现普天同文理想的必经之途?换言之,要实现普天同文的理想,是否应当回到造字之初、回到图象性符号文字?这就需要从符号传播和符码类型与传播效率的技术层面上分析。

三、理想符码的传播机制

(一) 符码类型与传播优势

从符号的传播效率来讲,一种适合通用的符号(广义语言)应当具有高效率 and 广泛的传播性。整个文字符号识别过程可以看做一个编码/解码的双向过程。从符号代码的传播策略来看,一种符码要获得有效的传播,应当具备低壁垒和高解码率:低壁垒指向编码过程本身简易,对传者的开放性较高,而受者高开放性则来源于解码成功率。高开放性能提升参与度,从而实现使用群体的扩张。这就需要用两对术语来说明如何获得高传播效能(Fiske, 1990: 59-65)。

社会语言符号学家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提出的“详制符码”(elaborated code)和“限制符码”(restricted code)(Bernstein, 1973: 23-35)概念可用于说明编码方式对传播效率的影响。详制符码是一种描述清晰而较少依赖交流环境的符码,它所陈述的问题较为复杂,其获得依赖系统性的教育训练;而限制代码则依赖于会话者的共同性,其会话内容的组织不是语法逻辑,而是友情(一种交际)。对于创建一种更易于传播的广义语言而言,详制性代码的优点在于,不依赖于小群体的文化共同背景,而其缺陷在于需要编码者的高素质,能力元语言壁垒更高;限制性壁垒也并非完全没有优点,其简化特征和形成关系纽带的交际性功能也是语言不可或缺的功能。

另一对概念是“宽播符码”和“窄播符码”(narrowcast codes)。详制性符码与限制性符码由编码特性所决定,而宽播代码与窄播代码则取决于受众结构。如果说宽播代码是易于传唱

的流行音乐,窄播代码则是阳春白雪的歌剧,只有少数观众能欣赏。就表意清晰性来说,详制符号有助于克服文化壁垒,形成宽播效应;但详制符号往往编码复杂,对编码者要求较高,因而又导向窄播符号。而限制符号则因其是简单诉求,对元语言能力无特殊要求而易于形成宽播效果。

(二) 编码特性与符号的混合理据优势

将上述编码特性落实为建立一种完美的通用语言,我们就需要寻找这样一种符号——其既具有较低的编码解码壁垒,同时具有高清晰的表意能力。从皮尔斯三种符号类型来看:

首先,规约符号在编码过程中接近详制符号,具有表意准确的特性,但对编码者要求较高;而解码时要求接受者参与到规约体系中,又接近于限制符号。

其次,指示符号是一种具有理据性的指称方式,它是指向对象但不加描述的符号类型。符号的指称有赖于秩序或关系的建立,可以是邻接、因果或印迹等关系。指示符号对编码要求低于规约符号。一只狗在雪地上的爪印足够让猎人循迹而找到。应当说,指示符号是一种实现通用语言的良好选择,且具有较高的编码效率。

再次,像似符号的理据性比指示符号更为直观,因而其对编码和解码者的教育、文化背景要求最低,通常是最能跨越文化界限的符号类型。不过,像似符号的问题在于编码效率较低,信息冗余度较高。例如,一张有狗的照片用来传递“狗”的信息显然不够经济,似乎缩减为只有“狗头”即可。那么,是否还可以缩减到只有一条狗腿或者一条狗尾?在简化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抽象和规约。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抛下任何一种符号类型。

设若理论上存在一种较为理想的通用语言,那么这种通用语言的表意符号类型应当是三种符号特性的混合,而且应当取得一定程度的均衡——这就契合了皮尔斯的完美符号构想。兼有三种特征的符号在表意的通用性与效率上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最有可能成为一种“普天同文”的理想语言。

(三) 图像化作为通用语言策略的分析

按照上述原则,建构一种理想语言,就是要回归理据性。直观的办法是“部分地”回到文字发展的原初——图与文尚未分化的阶段。那时的文字尚处于任意武断性较弱而理据性较强阶段,具有较高程度的指示性和像似性。反之,可以推论:文化发展过程中规约性消除得越彻底,文字符号的易识别程度就越高。文字的图形化策略,优势和劣势都相当明显。一方面,图像化语言仍是一种有效路径,因其像似性、非逻辑性、开放性而接近一种自然语言。某种意义上说,图像语言因其理据性而从未发生类似于文字语言的根本性剧变,具有连贯性。原始部族的图腾符号的形式与今天的企业标识在本质和使用上都极其相似。最原始的指路牌所用的指示符号与今天奥运场馆中的指向箭头也不会有天壤之别,结绳记事与今天的二进制代码虽无直接继承,却依然是同一种结构原理。可见,混有理据性的符号信息往往更能够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冲击。这是图像化文字的优势所在。

文字图形化策略的天然缺陷是,图像本身的抽象概念表意效率并不高。至今仍在使用的“东巴文”是一种易于解读的原始象形文字。实践来看,其能表达的抽象概念复杂程度与现代语言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图形文字并不是真正的消除文化规约,而是借助图像、指示等符号指示方式来丰富和加强抽象文字语言的形象化、生动化。现代文字的图像化的策略必须结合当

前文化现实环境来加以设计。公共视觉符号就是一种经过现代化设计的图像通用语言。迄今最为典型的一套通用视觉语言是“国际文字图像教育系统”(ISOTYPE, 全称“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发表于1925年,发起者为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该系统为当前的公共图像符号(pictogram)和信息图形(infographics)的设计奠定了基础。该系统的思路是将图形作为某种标准化的通用语言实现公共化的沟通。该系统提供公共场所等统一化图形设计的底本。今天的地铁、公交、飞机等诸多公共指示标识系统都可以视为该系统的直接或间接的演变。

这套系统与传统意义上通用语言追求者的努力方向并不相同。其目标不是通过对现有自然语言的取代来实现文化与语言的大一统,而是对现有语言做一种广义化的拓展和符号类型上的补充,使得语言成为一种更富包含性的符号沟通系统,更接近一种所谓“完美”符号体系。它既不是对原始象形文字的回归,也不是现代自然语言的直接替代。它只能是现有广义语言符号家族中的又一员,并成为人类表意系统——文化本身的不可或缺成份。

四、语言范畴观念的转型——混合语

从传播角度上说,一种对现有语言的替代性方案是必然陷入通用(be in common use)与使用(actual use)的悖论。人工语言,究其创制的根本原则,是创造一套类似密码的通用性符码,因而其必然是“共时性”的系统,以实现通用和易于掌握的目标,而我们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则是一套历时性的开放动态系统。而所有的人工语言努力的方向,都走向一个根本性的向度悖反。自然语言在使用中复杂化,意义越来越为其当下使用所决定,并不断生成新的表意词汇,而人工语言则对现有自然语言实行“去复杂化”,而成为托尔金所说的那种枯死的语言。

实际上,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去界定今天的语言,以及如何看待“普天同文”的文化学意义。就技术策略来看,我们早已实现普天同文。实现方式之一是文化输入与输出中自然形成的世界语——英语。现代英语发展到今天,是吸收了350多种语言中及词汇逐渐形成的全人类自然语言。中国已成为英语的第一使用大国。英语实际上已经与原初的那个政治性国家概念关系相当疏远。

此外,“通用”与“使用”的矛盾还带出普天同文理想的另一个悖论——“标准化”与“文化化”。标准化语言应当是去文化的,而自然语言的发展则必须是文化语境当中的涌现。我们只能通过文化的博弈去实现文化的保存、对抗。标准化的人工语言,并不带来文化平等政治平等。将语言乌托邦作为政治乌托邦实现途径的思路一开始就错了。

如果从技术标准化来看,普天同文理想已经实现了。二进制语言可以再现任何一种符码,且是“外星人人都可看懂的文字”。近年兴起的“二维码”也是一种通用语言,其所赖以转移移动终端的机器识别是无文化的,因而也是跨文化的。就人类交流的符码类型来看,广义语言已形成三个大类。

科技指示符码——科学语言(数字、音符、代码、曼瑟尔表色系统、音标)与机器语言(C语言、java、二维码);文化规约符码——自然语言(图像、自然语言、网络生成符号、艺术文本);混合理据符码——类语言(公共标识系统、手语、旗语、各种指示符号、图像混合语言、图像化音乐记谱语言)。

这三种符码实现通用的路径各不相同,科技符码是相对纯粹的指示符号,其倾向于指向对象的指代,拒绝文化阐释;科技符码本身没有明显文化差异,没有地域或文化属性。文化规约符码来源混杂,是不同文化群体中不断涌现的结果,其通用化的方式是文化博弈;而混合理据符码介于两者之间,它旨在提供公共场所的最有效识别。由于混合了像似性、指示性和文化规约性,它既不会象文化规约符号那样“任意武断”,也不会像科技符码那样全球彻底一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伦敦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的项目图标设计,既有文化北京的差异,也有相似和指示的清晰连贯的理据而易于识别。

最后,人类语言系统在符码化的方向上正在全面突破,其路径是多中科技语言的聚合。在这些语言之间会形成专业化隔膜,这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一套医学术语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可能像外星文字那样难解。身处地球村的人类文化生活中的自然语言不仅不会趋向单一的标准化,反而会在文化的多样性中进一步复杂化,并在使用中成为具有动态特性的多元混交流符号(图形语言、多文化语言、计算机语言、亚文化圈的小众语言等),而这一结果是由于——生活本身不可化约。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丁尔苏(2012).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并行不悖.载《符号与传媒(第4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Ding, Ersu (2012). Arbitrary run parallel with the motivation of symbols. In *Journal of signs and media* (Vol.4).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刘安(2009).《淮南子》(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

[Liu, An (2009). *Huai Nanzi* (Vol 8).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徐冰(2012).《地书:从点到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Xu, Bing (2012). *Dishu book: from point to point*.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张彦远(2007).《历代名画记卷第一·叙画之源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Zhang, Yanyuan (2007). *Famous pictures in history: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aintings*. Nanjing: Jiangsu Art Press.]

赵毅衡(2009).《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Zhao, Yiheng (2009). *Words not the meaning: on culturalism as the form of literar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赵毅衡(2011).《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Zhao, Yiheng (2011). *Semiotics: principles & problem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Bernstein, B. (1999).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assirer, E. (1949).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e, T. (1997). *Utopia*.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Peirce, C.S. (1931-1958). *Collected papers* (Vol.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ussure, F. de. (196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Tolkien, J.R.R. (1999). *The lord of the rings*.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责任编辑:李新颖)